

他们,这样走进问题少年们的心里

3年助力30余名涉罪少年重塑人生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张一诺

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办案区的谈话室内,菲儿(化名)披散着长发,将脸深深埋进发间,不论检察官苦口婆心地说什么,她的手都只是反复地抠着手机上的小挂件。对于检察官的问题,她仅是简单地点头或摇头。

“她就是辍学后在社会上交了不良朋友,又被父母断了生活费,才在他人的怂恿下跟着去拉车门盗窃的。”在承办检察官钱卓艺的眼里,这个刚满16周岁的小姑娘,完全有机会通过帮教回归正途。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该怎样做,才能让正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她,愿意打开心门。

用一句话敲开心门

经过深思熟虑,钱卓艺决定对菲儿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委托金华市悦欣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对她开展6个月的帮教考察,并安排3名大学生社工志愿者和专业社工一起,对菲儿结对帮教。

3名志愿者都是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因为年龄相仿、兴趣相近,几次家访下来,菲儿对这些大哥哥姐姐,明显愿意开口了。

大约1个月后,钱卓艺再次把菲儿和帮教社工、大学生社工志愿者约到检察院。

“上次和您谈心之后,我想了很多。我在学烘焙,想回老家开个甜品店,现在正努力攒钱。一份前台的工作每月4500元,一个整理资料的兼职一天150元,这样,我每个月可以存下3000元,再加上我爸妈的资助,一年左右我的甜品店就可以开张了。”再次面对检察官,菲儿不再对未来迷茫,而是有了明确且细化的勾勒。

不过,志愿者社工的帮教并未结束。

“我叫范亿,范是范闲的范,亿就是‘一个小目标’的那个亿。”这次,浙江师范大学社工专业研二在读的学生范亿,也加入了对菲儿帮教的队伍。虽然才第一次见面,但范亿仅用一个开场白,就敲开了菲儿的心门。

范亿也是00后,只比菲儿大几岁。她与菲儿交流前,就提前向另3名志愿者社工详细了解菲儿的情况。范亿告诉记者,书本上的专业知识学了很多,但刚开始接触涉罪未成年人的时候,心里还是没底。直到和几个帮教对象接触、交流,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虽然在法律上被定义为犯罪嫌疑人,但同样是处在社会关系里的‘人’,是可以被教育、感化、挽救的。”

与帮教对象建立信任和联结,是社工开展帮教工作的重要一环,像范亿这样的大学生恰好有天然的优势。比如菲儿,之前被多次劝导回归校园,她都不愿意,也不说原因。范亿加入帮教后,才得知她曾在学校里遭受过校园霸凌,对上学充满抵触。

“如果无法回归校园,她又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就很容易再次误入歧途。”范亿除了像大姐姐和朋友一样,对菲儿生活、交友正向引导,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普及一些法律知识,帮助她重拾信心,制定详细的人生规划。

经过2个多月的帮教,大家发现,菲儿已经和之前的不良朋友断了联系,对于未来是否回归校园虽然仍未表态,但不再抵触这个话题了。

涉罪少年变反诈志愿者

“我们办理的案件中,60%以上的罪错未成年人是因结交不良朋辈误入歧途,80%以上的孩子存在家庭不完整、家庭关系僵化的情况,父母命令式、指令式的教育方式只会让这些孩子更加叛逆。”婺城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负责人丁夏维说,大学生社工志愿者的加入,不仅是对检察官、社工训诫教育的补位,更有利于帮助涉罪少年建立起积极健康的朋辈关系。

大二学生肖帅,也是大学生社工志愿者的一员。不久前,肖帅在一场帮教活动中与小新(化名)结对。17岁的小新,自小父母离异,跟随父亲生活的这些年,因为父亲常年不在家导致他情感缺失,迷失在所谓的“江湖义气”中,连续5个月流窜盗窃



大学生社工志愿者在帮教。

十次。

“其实小新挺懂事的,是所处环境给予他太多负面影响。”考虑到小新正处于敏感的青春期的,承办检察官在与社工团队讨论帮教方案后,决定引入大学生社工志愿力量。

初期,在几场由社工主导的法律教育分享会中,小新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而肖帅加入后,像“哥哥”的他,和小新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在进一步接触中,肖帅得知小新抵触“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便鼓励小新自学法律知识。后来,小新还在肖帅的鼓励下走进社区,开展了一场“反诈骗”主题分享会,成为了一名反诈志愿者。

“还有一次,我们一起走访一个父母都被羁押的小学生。面对我们的询问,这个孩子始终一字不答。这时候,肖帅发现孩子养了一只猫,就从同为养猫人这个角度入手,不断引出话题。没想到,这成了促使孩子接受我们的突破口。”社工张倩说。

如今,小新已经在一家餐饮店工作,因为表现良好,还涨了工资。工作之余,他继续参与反诈志愿者的活动。近日,小新也顺利通过附条件不起诉的6个月考察期,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30余名涉罪少年重塑人生

范亿和肖帅,是婺城区检察院引入大学生社工志愿者参与帮教,与金华市悦欣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建立的大学生社工团队成员。这个团队共有两支队伍,一支由本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力量组成,名为“young社工”团队。

作为婺城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检察+社工+N”帮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社工志愿者在经过专业的岗前培训和签署保密协议后,可以直接参加部分帮教工作,为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注入新鲜力量。

另一支队伍,则多为非社工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主要负责带领处于帮教考察期的涉罪未成年人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比如在高铁站做引导员、在社区服务独居老人等。

“自2021年引入第一批大学生社工志愿者开始,我们发现他们在帮教中有独特的优势。但他们本身也涉世未深,如何在发挥他们最大优势的同时,让帮教工作更加规范有效,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课题。”丁夏维说,2021年以来,共有30余名大学生参与该院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其中,有十余名大学生毕业后成为了正式的司法社工。经过大学生社工志愿者的帮教,有30多名涉罪未成年人成功回归社会,至今无一人再犯。

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近日,有女装品牌创始人公开表示,不少商家都被强制要求赠送运费险,给商家运营带来很大负担。同时,还出现职业退险人涉嫌骗保,赚取运费险赔付与实际快递费用之间的差价。运费险怎么变了味?

商家:运费险成强制性要求

某女装品牌创始人发文称,退货运费险的初衷是为缓解网购过程中因退换货而产生运费纠纷,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然而随着竞争加剧,平台为了吸引消费者,将退货运费险逐渐变成强制性要求,大大增加了商家的经营压力。

广东深圳电商卖家徐先生告诉记者,为消费者购买运费险的确能对销量有帮助,运费险价格一般会根据大数据推算得出,部分品类退货率很低,运费险只有不到1元钱,但经常退货的品类平均在3元左右,退货越多,保费越高。

徐先生说,“比如现在我的店退货率是10%,运费险是0.3到0.4元,如果退货率高于10%,运费险就会增加到0.4到0.5元。现在是根据退货量来算,每天发货量多少,再平摊运费险,整体还是自己承担的。”

而部分电商平台要求商家必须购买运费险,才能参与促销活动。对此,徐先生认为,这有变相强制搭售运费险之嫌,可商家如果不参加“6·18”“双十一”等活动,销量又上不去。这让一些退货率较高的商家陷入两难选择,特别是遇到专门的“职业退险人”,不仅东西没卖出去,还赔掉了运费险的购买费用。

个别快递员主动找商家合作赚差价

记者网络搜索发现,有的笔记会专门教人如何“薅运费险羊毛”,比如点击退货,运费险会赔付用户10元,但找到熟悉的快递公司谈好价格,运费可能只有5元,从中赚取差价。

一位商家表示,经常接到一些退货单,对方连包装都没碰,原路退回。“直接重新贴一个单号,明摆着撸运费险,像这种小包裹,快递可能3元钱就发了,但运费险要补给他8块钱,这样他就赚了5元钱差价。”

一位电商从业者甚至称,有相熟的快递员主动找他来“合作”,去别的商家赚运费险的差价。“具体操作就是去买有运费险的产品,收到货后就退回去。快递员给我的价格是3公斤以内5.5元,运费险根据城市的不同,可以返现12元,这样一单可以赚6.5元,说起来是可行性,但是挺不道德的。”

如此行为不仅不道德,更涉嫌触犯法律。早在2015年,国内首例“互联网保险”诈骗案在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通过虚假购物投保并申请运费险理赔,共计骗取保险赔款20余万元,最终以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

专家:电商平台要加大打击力度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副秘书长宋占军表示,保险法有明确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平台方强制商家购买保险涉嫌违法,但平台利用自己的地位,以参与活动为条件设置门槛,并不违法。

“保险公司并没有强迫商家购买保险,它实际上是商家和平台之间达成的协议。尽管在商家看来这是平台的强势,但归根结底是平台和商家协商后的结果。”

对于网络上大量“薅运费险羊毛”的行为,宋占军认为,除了电商平台加强打击力度之外,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改变赔付方式,从根源上解决难题。

“实践中,消费者的退货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平台,包括保险公司指定快递公司来取件,另一种是消费者自由去选择快递公司的服务。在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薅羊毛’的情况,其实还是快递报价和保险公司定价之间不匹配。可以通过由保险公司统一采购第三方服务,或者电商平台加强对于大规模退货行为监管的方式来有效规避。”

『运费险』怎么被薅成了『生意』?